

碟碟不休

## 如何谈论没有看过的电影

■韩连庆

【多年前一位前辈曾跟我说,书读多了会发现留给自己说话的余地很小。】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的著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喜欢讲笑话,其二是喜欢讨论电影。齐泽克是讲笑话的高手,更是分析笑话的高手。即使那些我们在茶余饭后耳熟能详的“段子”,到了齐泽克的手中也能跟康德、黑格尔、拉康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联系起来。有好事者曾经将散落在齐泽克各类著作中的笑话收集起来,编了一本《齐泽克的笑话:你听过那个关于黑格尔和否定的笑话吗?》(Zizek's Jokes: Did You Hear The One About Hegel And Negation?)。有朋友看过中译本后惊呼:这么“污”的书怎么会出版?我说:这已经是“和谐”过的版本了。自从有了这本书之后,齐泽克再出新书总会引起一部分读者的不满,笑话在哪里?

我最早关注齐泽克是从读到他分析希区柯克的电影的文章开始的。我以前总觉得希区柯克的电影手法很过时,但是在齐泽克的“解剖刀”下,似乎他的电影中的每一个镜头都充满了哲学含义,尽管齐泽克的这些分析并不总能让我完全信服。齐泽克还编过一本讨论希区柯克的文集《不敢问希区柯克的,就问拉康吧》(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有人曾说,齐泽克讨论电影相当于给书画插图,用来

图绘他的哲学。我有位朋友抱怨当下的影评语言乏味空洞,我说那你就读读齐泽克的书吧,“绝世高手”还是有的。我后来养成个习惯,读齐泽克新书的时候总会自问:怎么还不分析电影?

齐泽克很诚实。他说,每看一部电影他总想就此写点什么,而有时候在讨论一部电影时,他其实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这倒让人想起法国作家皮耶·巴亚德(Pierre Bayard)的那本《如何讨论你没有读过的书》(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巴亚德指的并不是那些只记住了书名和作者就在人前卖弄风雅的人,而是说太多的信息会让我们无所适从,所以为了在阅读时能有收获,最好不要把书全读完。例如,很多关于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的论文的作者实际上并没有把整本书读完。这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所谓的经典著作,就是老师要求学生必读的,但最终老师和学生都不读的书。

悖论的是,巴亚德的这些说法却是只有在读过很多书之后才会总结出的心得。香港作家董桥曾说,根本没有经典这回事,书好都是某个段落好,某个章节好,或者某个结论好,它不可能完美。多年前一位前辈曾跟我说,书读多了会发现留给自己说话的余地很小。

齐泽克在《少于无: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里也提到巴亚德的那本书。他赞同巴亚德的观点,认为一本详尽阐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书肯定满篇注释,令人乏味,缺少活生生的洞见。对黑格尔的

最好的阐释往往是片面的,正所谓“一叶知秋”,从一个侧面推断出他的哲学的全貌。尽管这样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但却令人耳目一新。这话实际上也是齐泽克的“夫子自道”。托尔斯泰说,伟大的作家也只不过是他在书写他的片面。伟大的哲学家亦然。

由此发出,齐泽克重新解释了哲学中的“知性”(understanding)和“理性”(reason)的概念。知性具有分析能力,将整体分解为部分,由此落下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把柄。理性并不是用综合来补充知性的片面,而是从知性中去除了试图客观、公正和全面的幻觉。换句话说,最初显得是知性的“以偏概全”的弱点,实际上却是它的最大之处。

齐泽克也是用这种知性来分析电影的。在《银翼杀手》的结尾,戴克发现自己也是复制人,他关于自己的记忆是泰瑞尔公司移植的。齐泽克分析说,这说明我们所有的特性都可能不是我们自己的,甚至我们的记忆和幻想也能人工移植,资本成功地控制了我们的幻想——内核(fantasy-kernel)。在希区柯克的《群鸟》中,加油站发生爆炸后,镜头越升越高,仿佛是个客观的远景,这时有几只鸟飞入镜头。齐泽克分析说,鸟是个异质的因素,破坏了此前的现实框架。同时,鸟的视角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我们由此观察现实,仿佛加油站的爆炸也是群鸟攻击人类的结果。在这两个例子中,一个是对故事内容的分析(只看电影简介即可),一个是对摄影镜头的分析,都不需要完整地看完一部电影。



爱乐者说

## 从“歌唱”着的交响曲说起

■李近朱

【比如,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年轻的中国作曲家龚天鹏,他的《第五交响曲》不仅用了人声的“歌唱”,更以取消乐章而在形式上显现出全新的交响结构。】

音乐源自歌唱。鲁迅先生说过,“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就是音乐的萌生以及音乐的初始,这大多囿于“歌唱”着的范围。即使到了由乐器演奏的音乐,其音色也常用“歌唱”这个美好的词语来形容:如小提琴如歌唱,大提琴男低音一般的浑厚,等等。因此,人声的“歌唱”是音乐的根基。

18世纪,经“交响乐之父”海顿的整合与改革,“交响乐”这个体裁渐有规范,如乐器的管弦乐队编制,如四个乐章的结构等。在其萌生与发展的最初时期,全然是纯粹运用乐队演奏的纯器乐作品形式。人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人声的“歌唱”,能够进入到“交响乐”这一大型的器乐体裁之中。此前,器乐与声乐共一阙情状,只在宗教性作品如清唱剧、弥撒曲以及歌曲等形式中得一见。那里,乐队只是处于为声乐伴奏地位。到了“交响乐”逐渐成熟年代,19世纪初叶,亦即在与海顿、莫扎特为伍的贝多芬时代,这位思想开放情感炽烈的音乐大师,就有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理念,那就是任何音乐形式都要服从于内容与情感的表达。

于是,在贝多芬的晚年,也就是1824年左右,他创作了他的最后一部交响乐,以表达他一生所尊崇信仰的“共和理想”。在器乐演奏了长长三个乐章之后,到终曲第四乐章,作曲家想把这一崇高的精神境界升华。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德国诗人席勒的名作《欢乐颂》。以音乐诠释这个用文字表述的共和情怀,必须使用人声咏唱。于是,在乐思的表达上,对于交响之规是恪守还是突破,这位从不循规蹈矩的作曲家,在创作上也曾经踌躇再三。

庆幸的是,在全世界每逢历史转折关头皆咏贝多芬《欢乐颂》的今天,我们终于聆听到了,早在1824年贝多芬下决心将人声的“歌唱”引入到了他的最后一部交响曲。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那个气息宽广、光彩耀人的“欢乐颂”音乐主题出现了。此前,不同的音乐主题曾向贝多芬“作秀”,但他用深沉沉重的低音弦乐乐句,作了斩钉截铁的否定:这个不对,那个也不是。在几次“否定”中,作曲家让“欢乐颂”突破羁绊,横空出世。终于,这个颂歌音调犹似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霞虹,极富生命力地出

现了,并演化为管弦乐队的全奏。直到人声的大合唱以“歌唱”汇成恢宏壮丽的大气势,贝多芬才酣畅淋漓地一抒心中的狂涛巨澜。这部交响曲寻找“欢乐颂”主题的过程,不仅是戏剧性的交响音乐发展,更是作曲家将人声的“歌唱”引入交响这个纯粹器乐形式之中所留下的一个突破性的理念。这个历程是突破“交响乐”规范的技术上的创新,更是走出古典跨入浪漫的一种带有思想解放意义的乐风更易。更重要的是,他在告知后来者:形式的规范,不应成为表达内容的桎梏。这就为后世音乐创作带来了宽阔的思路,并让今人有幸聆听到更多具有创新意义的交响杰作。

瓦格纳始过这样的话,“交响乐”形式止于贝多芬。但事实是,除了贝多芬虔诚的继承人舒伯特、布鲁克纳、勃拉姆斯等在浪漫时期恪守古典风范的少数人的少数作品之外,先师在最后一部交响曲中所开拓的新路径和体现的新理念,在其身后的“交响乐”体裁中,依然没有止步,而是在前行,并带着更多元更新异的交响,走入新世纪。

以横跨19和20世纪的马勒来说,作为交响大师,他的9部交响乐不乏引入人声“歌唱”之作。而蜚声20世纪的交响大师肖斯塔科维奇,他的15部交响乐,也将管弦乐队与合唱队合璧联袂,作了交响性的演绎。问题不在于贝多芬的后来者师从先哲有了“歌唱”着的“交响乐”形式,而在于中国爱乐者亲切称谓的从“老贝”到“老肖”,“交响乐”形式已经发生了嬗变。海顿式的古典交响乐样式几乎不复存在。号称在表达内容上“包罗万象”的大型音乐体裁“交响乐”,已随着与时代相系的作曲家的开拓性思路,走向了“交响乐”的新风范与新形式。

比如,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年轻的中国作曲家龚天鹏,他的《第五交响曲》不仅用了人声的“歌唱”,更以取消乐章而在形式上显现出全新的交响结构。10个乐段的组合,引入奏鸣曲、协奏曲以及合唱曲作为基本表现形式,这就大幅度地对于传统交响乐形式作了颠覆性的创新。

可见,远在200多年前,贝多芬的一个在当时看来很大,现在看来未必很大的创举,将人们最为熟悉的“交响乐”形式作了由小而大由少而多由新而更新奇的创意与创造。这便使从古典走过来的“交响乐”,在新的意境中,流动起来,活跃起来。唯此,才有了迈进和前进,才使得已经有超过近300春秋岁月的“交响乐”形式,至今还有生命力。让艺术生息不息,虽可以恪守传统,但推动其与时俱进的,还是创新和唯有创新。

## 关于国际会议

■苏青

### 国际会议

摆一张桌子,放百十张座椅  
再插上一面主办国的国旗  
不同肤色的语言轮流走上讲台  
分别和麦克风隔空较劲

语言这个家庭很不和睦  
聚在一起总要请人来回调停  
据说,相互之间越是六亲不认  
这样的聚会就越具国际性,就越有水平

好在幻灯片都很重感情  
演出结束之后,都想挤进一个叫U的盘里  
通常,里面的一些文字和图片  
日后会在另一摞装订成册的纸里相爱成亲

在有学问的人嘴里  
这就叫国际会议  
每一个参会者,都渴望  
从后排挤到前台坐上第一把交椅

### Mr. Dahmali

Mr. Dahmali  
是摩洛哥电气博物馆馆长  
国际博协科技馆专委会主席  
在中国人看来,职位大概相当于市局级

师局级的 Mr. Dahmali  
一个人主持会议,并包揽全场翻译  
把法语、阿拉伯语一一介绍给英语  
接待客人时,还优雅地客串 Volunteer

在中国,师局级官员通常只需演一出戏  
拿着秘书写好的稿子上台讲话  
——其他参会者讲话只能叫发言  
关注的是职务高低姓氏笔画的排序

Mr. Dahmali  
你究竟是行政官员、博物学者  
抑或是一名跑堂的伙计  
在中国,通常这是有严格区别的  
如果弄混了,就得罪人说不起了

Mr. Dahmali  
我们真的很同情你  
混成一个人操办一场国际会议  
怪不得我的小伙伴要把你译成“大马力”

### 茶歇

Tea Break or Coffee Break  
在中国,通常翻译成茶歇  
意思是,嘴巴和喉咙交锋累了  
抽空再去把饮品和糕点蹂躏

其实,茶的主人们  
并不想真正歇气  
只不过是换一个战场  
向另一个战场转移

当每一种语言和手势  
都攒够了精神和力气  
于是,又回到原来的战场  
重新操起斗嘴斗脑的武器

闾苑有书

【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做法,往往会让别人记住,同时对别人或者这个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前段时间科幻界爆出一起抄袭事件,惹得被抄袭者之妻在愤怒之余,写下一篇《想起了十多年年前的一件往事》散于网络。这是一段与笔者相关的往事,很多年前的往事。

那是2003年,上文作者还是学生,担任北航科幻协会会长。当时该协会牵头举办了一届面向京津地区大学生的“原创之星”科幻征文大赛,我与科幻作家杨平、凌晨担任评委——后来的科幻作家陈帆帆和夏笳都是此次赛事的获奖者,自此走上科幻道路。不过大赛也出了点问题,那就是有一篇获奖征文被举报抄袭。事后我与两位作家评委商议后,给上文作者打了电话,说要出个声明把奖撤回。针对此事,作者在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当时星河老师对我说,出了事当然不好,但是不要害怕。我们当时没有发现,是我们的能力不足。现在既然知道了,该道歉道歉,该追责追责,这不会损伤我们的公信力,反而是对我们的督促和鞭策。”

然后作者接着说:“是的,十四年后,我依然记得这段话。”这件事我记得十分清楚,但那些话语早已忘记。当我读到这番话时,能够明显感觉到思路和措辞确实是自己的,但具体内容竟丝毫回想不起,一句都不记得。

但是,那孩子记得;十四年后,那个早已不再是孩子的人依然记得。

其实那件事,作为评委我也有责任,我们都负有责任。但是现在,我却多少感到有些欣慰,因为我的言行,对一个年轻人曾有过一点良好的影响,以至于多年之后还深深记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对别人乃至这个世界的影,都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我有一个姑父,前几年因病早逝,在他弥留之际,我给他写过一封信,在信里同样回忆起一件往事。

当时我暂住在祖父家,他送给祖父也就是他的岳父一尊唐三彩马。我可能表现得比较好,爱不释手地把马拿在手上把玩。他看到了,说回头我给你拿一个小的来。他看似随口一说,我根本没在意,那时大人对孩子的承诺往往就是那么回事,他就那么一说,我就那么一听,过后也就忘了。

后来我要回父母家了,临行前的最后时刻,

飞沿走笔

## 纸媒数媒和“生媒”将三分天下

■张田勤

【美国哈佛大学的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等人在2012年9月28日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他们成功地编码出一本5.27兆比特的DNA图书,书名叫作《再生》。】

包括《渤海早报》《假日100》等,至少有16家纸媒没能见到2018年的阳光,它们都停刊或休刊。

没有人永远是18岁,也没有人永远风华正茂。这句话用在纸媒上同样贴切。纸媒的退场与数媒的崛起早已显露端倪,也是新旧之交的2006年底,瑞典议会决定,从2007年1月1日起,停止出版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连续印刷和出版的报纸——瑞典的《国内邮报》,这个纸媒发行了362年,它将被同样内容的数媒代替,公众可免费阅读《国内邮报》数字版。

即便纸媒退缩,人们也还是需要信息传播,而且需求量更大,因此提供信息和知识的媒体或载体会永存。数媒的应运而生并非取代纸媒,而是参与媒体市场的竞争,或与纸媒平分秋色。

不过,在纸媒和数媒并存的时候,一种人们还未察觉的媒体(出版物)——“生媒”已悄然问世,而且很可能要打破纸媒数媒平分市场的局面,转而三分天下。

数媒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托,抛开传统的以排版印刷和物流发行为特征的纸媒运作和信息传播模式,把文字、图形、图像、声音、视频影像和动画等信息素材转化为二进制数的形式,并加以记录、处理、传播、获取和贮存,最主要的是在网上迅速传播。

但数媒是以生物技术和生物物质为基础。1950年查加夫(Erwin Chargaff)发现DNA上腺嘌呤(A)数量等于胸腺嘧啶(T)数量,鸟嘌呤(G)数量等于胞嘧啶(C)数量,由此总结出DNA碱基组成的规律,所有DNA中碱基组成必定是A=T, G=C,这一规律也暗示A与T、C与G总是相互匹配。

这也提示,生命和遗传的核心也是数字和数字定律,其中的原理和技术其实可以用作知识和信息的存储和传播载体,只不过当时把生物物质作为媒体载体的想法尚未萌芽。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创新开始出现。

根据碱基A总是与T配对,G总是与C配对的稳定搭配,研究人员设想,可以把数字技术与生物技术结合起来,编撰成一种全新的出版物——DNA图书。也就是利用计算机的二进制数字“0”和“1”与四种碱基进行转化编码,编程,把数字出版物所编码的所有文字、图像、符号等再编码进DNA中,制作成DNA出版物。在阅读时,再利用DNA测序技术把DNA密码还原为数字编码,就可以解码和阅读。

美国哈佛大学的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等人在2012年9月28日的美国《科学》

他竟然真的拿来一尊小唐三彩马送给我。三十多年过去,这尊唐三彩马珍藏至今,其间曾坏过两次,都被我悉心粘好。其实我对唐三彩本身并没有那么喜爱,但他信守承诺的做法却让我十分感动,尤其是对一个孩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却深深地记住了这件事。所以这次我在信里告诉他:您的行为,影响了我,我再以同样的方式影响别人,别人再去影响别人,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您影响了这个世界。

上文主人公的回忆与感慨,同样也勾起了我的回忆与感慨,让我再次想起那件事,以及我的那番话。

——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做法,往往会让别人记住,同时对别人或者这个世界产生深刻影响。

我有一个朋友,学生时代曾作为助手参加过一次大赛的评委工作。其实那次大赛未必严肃,因为评委都来自参赛各单位,最终各个奖项自然会花落这几家;当然即将“花落”的那些作品也确实不错,只是对于其他作品的审阅就有些走过场。但有些人就连所谓的过场也不愿再走,一个评委声称“我们累了,别的作品就不看了”,其他评委居然以默认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我这个朋友试探着问:要不只看一下初评的前几名?评委们依旧表示不想再看。此举终于激怒了另一名学生助理,他对评委们说:你们知道参赛者完成一个作品有多不容易吗?你们就这样随随便便地不看了?不行,今天你们必须看完!结果几名评委慑于这名学生的威胁,居然真把那些作品看完——尽管肯定不会给奖,尽管依旧是那个笑话,但那些参赛者的心血总算没有完全白费。

朋友对我说:我没了这个勇气,但我还是非常佩服他。后来我做了大学老师,但凡担任评委,无论大小赛事,再累也要把所有作品都认真看完。

——这就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这就是一个面对强势权威敢于发出自己内心微弱但愤怒声音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你正在影响这个世界

星河

杂志上发表文章称,他们成功地编码出一本5.27兆比特的DNA图书,书名叫作《再生》。这本书不仅有文字,还有图,图文并茂,有5.34万个单词,还有11张JPG格式的照片和一段Java脚本程序。

又过了一年,欧洲生物信息研究所(EBI)的尼克·戈尔德曼(Nick Goldman)等人编撰了另一本DNA图书《莎士比亚诗集》。该书编入的内容有,莎士比亚所有的154首十四行诗、一篇沃森和克里克DNA双螺旋论文的副本、一张戈尔德曼等人所在研究机构EBI大楼的彩色照片,一段这次试验使用的软件算法(a Huffman code,描述数据如何被转换的文件),还有一段长达26秒来自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剪辑音频。信息总量约739千字节。

这本DNA《莎士比亚诗集》内容更丰富,而且包含了一个音频文件,也更符合数字图书的标准。与《再生》相比,DNA《莎士比亚诗集》的编撰更优化,更完善,操作性更强,也更实用。戈尔德曼等人编撰DNA《莎士比亚诗集》的原理与丘奇等人编撰DNA《再生》的原理和过程相似,但是,更进了一步。他们把数字内容的二进制码(0,1)改成三进制码(0,1,2);然后用这种三进制码来对应DNA的四个碱基(A,T,C,G),从而将三进制码编写成一个DNA序列,使整个序列的所有内容都获得四个副本。如此一来,当任何一个拷贝(副本出错时,另外三个副本可供参考认证,能避免错误和确定内容的准确性。此外,研究人员还为编码的每个DNA片段的首尾加上了索引标识。

当数字内容编写进DNA后,再用专用设备合成DNA《莎士比亚诗集》。在读取或阅读DNA《莎士比亚诗集》时,先把合成的DNA《莎士比亚诗集》放入标准化学试剂,然后用DNA测序仪根据索引标识,将各个DNA片段依顺序粘成原来的DNA序列,再转译到数字文件的二进制码,形成电子文件,在电脑上阅读和使用。

合成的DNA《莎士比亚诗集》只有沙粒般大小,用DNA测序仪把DNA《莎士比亚诗集》中的信息还原为数字文件时发现,它与原始数字文件的信息100%重合。

DNA出版物的优势在于,它能长期存储信息,它的内容至少在1000年时间内也能够被读出。但是,计算机硬盘和光盘保存数据只不过50~100年。而且,由于DNA能存储更多信息,理论上计算,一克DNA即能存储上千亿个字节,相当于1000亿张DVD光盘的内存。全世界一年的数字信息总量约为1.8ZB信息,可以被存储在约4克的DNA中(ZB是信息量单位,等于10的21次方,常见的GB是10的9次方)。

不过,DNA出版物不能修改,还可能像数字出版物那样通过网络简易而实时传播。不过,人工智能的发展,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结合的奇点出现时,这些问题都不难解决。那时,“生媒”也极有可能挑战和取代今天崛起的数媒,因此将是纸媒、数媒和“生媒”三分天下。一切皆有可能!